

一次仰望,发现一道古文化地层

## 吴金鼎:龙山文化的发现者

□王绍忠

一代考古大师吴金鼎先生系潍坊景芝镇万戈庄人氏,出身农耕世家,祖辈贫寒。深明大义的外祖母见其聪颖好学,慷慨资助,让年幼的吴金鼎就读于安丘德育小学、潍县广文中学,毕业后考入济南齐鲁大学就读。1928年,吴金鼎怀着“知识救国”的宏图大志,刻苦深造,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,师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先生,系统攻读“人类学”。

早在齐鲁大学学习期间,他便利用休假时间,外出从事实地考察活动。1928年3月28日上午,他临时取消了去章丘县东平陵城的计划,决定到城北5里之遥的城子崖考察。上午9时,他刚到达,举目仰望,竟然有了神奇的重大发现。原来,河畔城垣横断面,有一条长达6米的截面,出现了成堆的灰土和诸多陶片,真是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一道古文化地层带清晰地显现于眼前。

吴金鼎惊喜交加,10天之后,他邀约董作宾进行了二次复查,初步认定此处为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村落。1929年7月到10月,吴金鼎先后四次来到这里,对龙山周边十华里范围的古迹进行了详尽全面的考察,在火烧过的红土层遗址中,发现贝壳、兽

骨,并寻觅到两枚骨针和五方石器,证明一片古代史迹便深藏于这片黄土层下。吴金鼎先生不经意间发现了埋藏在地下4000年之久的城子崖遗址,这真是“千载沉睡无人知,一朝醒来惊天下”!

吴金鼎将这一重大发现汇报给“中国考古学奠基人”李济先生,先生对此感到十分兴奋和震惊。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轰动了整个史学界,引起了全国教授、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。1930年11月初,中央研究院及山东省政府联合组成了“山东古迹研究会”,双方各派四名代表。11月4日,在山东大学工学院召开的成立大会上,研究确立了遗址的发掘计划。研究院方由李济、吴金鼎、董作宾、郭宝钧参加,这也是中国人首次独立完成史前发掘的整个考古过程。

1931年,在李济、梁思永主持下,对城子崖遗址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挖掘工作,挖掘面积达1900平方米,发现上层为春秋时期的地层,下层为龙山文化时期的地层。沟内惊现了山丘似的陶片、石器等物品。自此,这里被考古界誉为“龙山文化发祥地”,俗称“黑陶文化”。

陶片经复原后鉴定,陶面光滑细腻,证明此时陶器的制作已由“慢轮”整修发展为“快轮”修复。器皿有生产型和生活型两种。生产型有



吴金鼎

石斧、石锛、石犁等;生活类有孟、杯、盆、碗、盘、罐、瓮、鬲、鼎等,发现最多的为民间生活制品。凝视每件陶器,可以触摸到世俗风情的脉搏。虽然大都略显粗糙,装饰图案也多为植物叶子、花朵、菱形、三角形等,但它们是对自然的高度概括和理性加工,足以彰显出向文明社会进展的步履。特别令人惊异的是陶片复原的“三角鬶”,薄如壳、黑如炭、亮如镜,硬如瓷,掂之飘忽若无、敲击声响似磬,具有玉石一般的沉静优雅之美,极具观赏价值。

发掘取得了重大的成果,吴金鼎撰写了龙山文化研究最早的一篇论文《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观察》,对龙山

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差异进行了讨论,同时对龙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黑陶做了十分生动、逼真的描述:“黑陶之质料极为细腻,内部亦极为均匀。表面有时显平行之细纹,器之底部亦有逆表针向之旋纹,是当时已有陶轮。”

全国学者将城子崖考古誉为“中国考古第一案”。龙山文化是分布于山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,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—2000年之间。这一结论已写入中学历史课本之中。而当年吴金鼎先生在龙山的重大发现,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。1948年9月18日,吴先生因患胃癌,久治无效病逝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考古卷》中,将他誉为“最有成绩的现代考古学家”。

时隔一甲子之后,人们没有忘记吴金鼎先生的重大贡献和无尽遗愿,1990年春,在山东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带领下,又二次拉开了城子崖东部发掘的大幕。二次发掘又出现了大量生活实用陶器,令人惊喜的是,还发现了城子崖黑陶的高端代表——陶溪。它高脖颈、长尖流,两条前腿并列,有一条肥大的后腿;宽扁的半环状抓手,活脱脱一只昂首挺立的大鸟。这表明先祖的陶塑已突破写实的禁锢,进入自由想象制作的阶段。

崂山风景秀,行路实在难,这是旧时到崂山的真实写照。德占时期去崂山只有台流路,南线在八水河一带被悬崖和大海堵住,上崂山只好爬天梯。上世纪30年代沈鸿烈亲自规划,修建了多条崂山旅游公路。其中以太清宫至刁龙嘴最为有名,这条路全长17.5公里,将崂东一带沿海名胜连接起来,到北九水的路也畅通无阻,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游览崂山,著名作家郁达夫就是一例。

他曾写道:“要讲伟大,要耐人寻味,自然是外崂沿海一带,从白云洞、华严寺到太清宫的路。”1934年7月13日,郁达夫和妻子王映霞、儿子郁飞所乘坐的海船午后一时到达青岛。当晚,郁达夫一

### 【名人印记】

## 郁达夫曾游崂山

□宋立嘉

家借宿在汪静之(当时在青岛市立中学任教)的同事卢叔桓家。第二天,郁达夫一家移居至友人早已为其租好的位于广西路38号的骆氏楼上,此后的一个月时间内,郁达夫一家皆居于此。房东骆氏本为杭州人,在青岛已住了近十年,与郁达夫一家相处得十分融洽。

到青岛后,郁达夫就盼望着游崂山,他读了《崂山志》,买了《全植物图鉴》等方面的书,先在文字上了解崂山,看了报纸,报纸所载的广告称:“到崂山去避暑,比牯牛山凉爽,比莫干山伟大,比北戴河美丽,比青岛市节省,崂山大饭店最相宜。”这很对他的胃口,引起他的极大兴趣。

8月1日早晨,郁达夫即由寓所出发,乘坐的是青岛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公交车。下车后,步行上山。板房桥之上尽是悬崖峭壁,公路曲曲折折,沿途林深树茂,茅草灌木丛生,路就修在峭岩的山腰间,盘曲往复,极尽转折之至,俗称“十八盘”。到柳树台,所买车票有“崂山饭店可以午餐”字样,就走进崂山大饭店吃了午饭。这崂山大饭店旧址是德国人1904年建成的麦克伦堡疗养院,饭店经营各种精美的风味西餐,其中以一磅重的精粉面包和海味拼盘著称。遗憾的是在饭店由于接待不周,“值事者董某,貌尤狞恶”,给郁达夫留下坏印象。

午饭后,郁达夫由柳树台东面下山,经观崂石屋,沿溪而至北九水庙(现在的太和观)。在当天的日记中,郁达夫记载,当时由九水庙至靛缸湾中途由饭店北面上山,五里可至蔚竹庵。庵有老道,名李祥资,高密人,住此处三十多年矣,山路开辟,皆由一人经营。山腹亦有小村落,仅茅屋数间耳。附近一带,统名双石屋村。自内九水的双石屋村外,向东北行,翻过山头,即达蔚竹庵。蔚竹庵上,山比庵高数倍,大石岌岌欲坠,老松盘绕其间,婆娑飞舞,由院中仰望,前临鳌洞,洞溪流水、鸣笛如曲,被人们誉为崂山十二景的“蔚竹鸣泉”。

在游览北九水的过程中,郁达夫还认真考察了很多石刻。“九水与九水庙之间,王子洞旁,有连捷桥题名碑,碑色很古。北九水庙前之保合桥,系光绪二十年、三十年修建,桥旁有勒石碑记。我所见之碑文,以柳树台西南下竹窝村中段氏妇之节烈碑为最古,系同治四年所立。当时该村中也似以段姓为大族,因道旁墓碑,姓段氏者独多也。”郁达夫被北九水的风光所陶醉,激情如潮,文思涌心头,在第三天后,精心创作了歌颂崂山的诗:柳台石屋接澄潭,云雾深藏蔚竹庵。十里清溪千尺瀑,果然风景似江南。

这首诗后来由郁达夫的侄女婿著名书法家黄苗子1981年书写,幅高4米,刻在内九水的二水路边双石屋村中的巨石上。

### 【民间记忆】

## 我在嘉祥二中读书的日子

□曹务堂

### 艰苦的办学条件

嘉祥二中坐落在一户地主家的院落内,后面盖了两排青砖瓦房,那就是我们的教室。室内没有天花板,大梁就悬在头顶上。记得有一天上课时,一个小壁虎落到一位女同学的脖子里,吓得她大叫起来。

我们教室后面是操场,当时学校没有围墙,而是在周围种了许多带刺的洋槐树当围墙。学校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洼地,方圆五六十里不见村庄。夏天是茫无涯际的绿色海洋,雨季到来,则是一片汪洋泽国。直到1960年我高中毕业,学校都没有电。每个教室在大梁上挂一盏汽灯,发出呼呼阵风似的声音,室内弥漫着浓浓的汽油味。汽灯很怪,过不了半小时就会自动变暗,这时就必须重新打气,使它再慢慢变亮。夏天时,因教室通风好,学生尚可忍受,可一到冬天就惨了。记得冬天上课时,实在冻得受不了了,老师就叫我们跺跺脚。下课后,我们就靠着墙根或在院子里两三人或四五人互相挤碰以取暖。当时我们把这种活动称之为“挤油”。

我们那一届是初中七级,共招生217人。根据当时的师资力量,分为四个班。记得开学后的一天下午,领导要新生到操场上集合,按身材高矮站队。然后要学生按“一二三四”的口令报数。结束之后,领导宣布,报“一”的为一班,报“二”的为二班,以

此类推。因为我报的是“二”,所以就分在了二班。

### ■“难解”的物理题

虽然50多年过去了,但我对一道物理考试题至今难忘,原因是,全年级217人,只有一人答对了这道题。题目是:“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,假如你跳一下,你会落在原地,还是会落在原地的后面?”我们都没有见过火车,更不用说坐火车了。于是我们只好凭想象认为,那肯定是在原地的后面了,因为在你腾空的那一刹那,火车已经跑出了一段距离。结果,试卷发下来之后,同学们都傻了眼,全都是错号,只有一位老师的女儿答对了,因为她坐过火车。教我们物理的是一位姓蒋的老师。我说:“蒋老师,怎么可能落在原地呢?”蒋老师微笑着回答:“你想看,地球转得快不快?”我说“快”。他接着说:“你现在跳一下,看看落在什么地方。”当时我依然不解,心想:老师,你怎么能拿火车跟

地球比呢?

由于学校地处农村,帮助农民劳动是很自然的事。记得上初一时我们曾帮助农民打过蚂蚱。学校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,夏初经常有蚂蚱肆虐,于是全校出动,每人手拿一个旧鞋底和木棍绑在一起的“拍子”,师生千余人,队伍浩浩荡荡,蔚为壮观。到地点后,分班一字排开,我们一边打一边把蚂蚱赶到地头预先挖好的沟里,然后用土埋上。

### ■无奈的“除四害”

我上初中时,“除四害”(即苍蝇、蚊子、老鼠、麻雀)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,那时人人一个苍蝇拍,不上课或课间操时,同学们就争先恐后地到厕所去打苍蝇。把苍蝇打死之后,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小瓶里,然后一个一个地交给卫生委员,由他记录下每人的“成绩”,每天公布。据我记忆,数完苍蝇后,没看见谁洗过手,当时学校只有一口井,而且离教室

很远。

打麻雀必须在晚上。所以,一到晚上,我们就扛着梯子到农户家的屋檐下去“摸”麻雀。逮着麻雀之后,将它的两条腿剪下来,然后交给卫生委员,两条腿算一只麻雀(注:后来一位生物学家向毛泽东建言,说麻雀是益鸟,吃害虫,功大于过。毛泽东采纳了他的建言,“解放了”麻雀,替换成臭虫)。

捉老鼠更是困难,必须在家里床底下放老鼠夹子。每次放学回家后,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老鼠夹子逮着老鼠了没有。如果有,那真是如获至宝,心里乐开了花,立刻把它的尾巴剪下来装进口袋里,然后带到学校交给卫生委员。

后来,为了响应“大炼钢铁”的号召,我们学校也建了一座高约十米的“炼铁炉”。不知为什么,当时需要石灰,而我们那里又没有这玩意儿,只好到50里外的县城去拉。记得当时我们班借了一辆马车,由班长驾辕,十几个男生用绳子在两旁拉。我们是下午出发的,到了县城已是掌灯时分,安排在县一中住宿。有一位同学跑到城里去观景。回来后他异常高兴,我们问他看见什么了,他说他看见汽车了。要知道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汽车啊!

我在嘉祥二中学习了五年,给我留下的回忆有酸也有甜。虽然五十多年过去了,但有些往事至今难忘,令我回味无穷。